

中国史学 思想通论

· 经史关系论卷 ·



◎ 吴怀祺 主编

◎ 汪高鑫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史学 思想通论

◎ 吴怀祺 主编

◎ 汪高鑫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吴怀祺主编:

汪高鑫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211-06225-6

I. ①中... II. ①吴... ②汪... III. ①史学史: 思想史—中国②经学—关系—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
K092②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0647 号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TONGLUN · JINGSHI GUANXILUN JUAN

作 者: 吴怀祺 主编 汪高鑫 著

责任编辑: 魏清荣 陶璐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3

开 本: 730mm×990mm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225-6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题 记

吴怀祺

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是民族文化特有的形态。这不仅仅是图书目录的分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涉及对中国民族文化特点的思考，成为解读传统史学意蕴的切入点。四部是怎样形成的，四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经与史、子与史的内在联系是什么，经史因缘形成过程中又有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问题不研究，要认识史学的民族特点，理解传统史学中深邃的史学思想，非常困难。

西方很多学人所以对中国传统史学有误判，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看不到中国史部典籍各个部分凝聚的观点、思想，是有理论的；更不理解中国的史中有经、有子，经、子之中又有史。他们只说自己的历史书中有理论，在哲学著作中阐释了历史观念、历史意识，但是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方式，更想不到，也做不到，或者不愿对中国传统的经、子内在的史学思想进行发掘。由此，他们作出错误的论断：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但史学思想贫乏。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的《经史关系论卷》写作的意图，就是想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几点想法。我们讨论经史关系，讨论子史关系，一方面是寻找发掘中国丰富的史学思想的路径，另一方面是看中西史学相异与相通处。

进入 20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发生变化,四部之学被重组,成为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经济学以及美学、逻辑学等现代学科,而此时的史学与古代的史有着直接联系,却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四部的经、子,成为史学的因子,特别是论及史学思想,更是如此。

所谓经、子与史,本来就是搅在一起的,经成为“学”,史也成了“学”,又与子学在一起,形成学术潮流,这是汉代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汉代学术的进步与成就。这后面有它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汉代诸子学的变化促成了经学的产生与繁荣,也导致了中国的古代史学走向成熟。这种成熟有历史编纂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史学思想的发展。崔述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①

目录四部分类,反映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史部作为与其他门类的文献相独立的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汉之刘向、刘歆父子作《七略》,即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除集略(《汉志》作辑略)为总汇各篇旨意的文字外,实分天下图与书为六类。曹魏秘书郑默作《中经》,荀勖因《中经》而作《新簿》,分图书为四部,第三部是丙部,《史记》入此部,但别的门类中也有史部书。东晋李充作《晋元帝四部目录》(以经、史、子、集为序)、南朝的谢灵运作《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主要作者应为殷淳),无所变化。王俭作《七志》,分图书为《经典志》、《诸子志》等七部分,《史记》是入《经典志》的。南朝梁的阮孝绪作《七录》,史也没有单独的“录”。直到《隋书·经籍志》,史书始真正成为独立的门类,并且固定下来。“自后,唐宋以下,皆不能移。”^②

最初,史为经之源,到混沌相错,然后再到成为独立的门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学的发展。而史书在文献著录中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后,成为传统文化的一大宗。从有利的方面来说,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史部文

^① 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第 395 页。

^② 见《隋书·经籍志序》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七,《经史子集四部》。

献在研究历史和史学中的作用。史部成为传统文化的一大门类，但史与经、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分而不可分。

经史关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又发生变化。经学的经，意义可以有多种视角的解喻。从文本意义上说，在古代不多的文献中，经是有重大社会影响文献的原始文本，它和以后派生出来的各种相关文本构成了体系，原始文本则成了经。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为适应政治统治、道德垂训和风化教育的需要，经过“圣人”删定、编纂出来的文献。此后，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增删、诠释，形成了经学；更由于观点差异，在形式和内容上反映出来，因此产生了经学上的各种流派。儒、道、墨等诸子各家大都有自己的经。儒家的经的组成，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各种本子。^①但我们是重点就儒家的“六经”与史的关系来展开讨论。

《礼记·经解》篇中有一段文字对儒家经籍的意义作了说明：“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挈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从意蕴上、从风格上说“六经”的。

“六经”是不是史呢？或者说“六经”是不是史书？这里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除《书》、《春秋》外，其他几部经书《易》、《诗》、《礼》、《乐》，要说就是史书，不是很贴切。但是经即是史，甚至还可以说经与史为一体，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的，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的，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六经”的每部经书不是孤立地、简单地阐述一种见解，反映一种历史意识，因而情况比较复杂。但每一部经书，相对地说，比较集中地表达

^① 参见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课《经学总述》，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一章，何耿镛：《经学概说》等。

了一类的历史见解、一类的史学观念，同时其中又有相关的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是史。

把“六经”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困难之处，除“六经”内容的真伪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六经”反映的时代背景时间跨度大，其主要内容涉及的历史时期包括通常称的三代，即夏、商、周。“六经”基本形成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以文字形式反映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相对地说它已经是成熟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传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如果把孔子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来看，这个说法就有它的合理性，说明“六经”在那个时代已经基本形成，这反映先秦时期中国的历史意识已经成熟。

这里说关于“六经”（实为“五经”）与史的关系。我们看到，每一部经书，容纳的史学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同时，又突显一种史学思想。这是多样性、包容性与具体性的结合。也就是说，一部经书，内中有不同的史学思想；每一个重大的史学理论，在不同的经书中，大都能找到相关的解说。经中有史，有史之“义”，即史学思想。如：

——关于天人关系的观念，“人”的历史运动总是与“天”的影响联系在一起。

——关于历史发展的通变论。

——关于民本论、德刑论在历史变动中的意义。

——关于史之记时、书事的规则以及史书编纂中褒贬议论的规定。

——关于礼制在维系社会秩序的意义方面的论说。

还有通经致用、经世致用、道德垂训等诸多方面的认识。

可以说，通常说的历史运动过程、历史动力论、历史反映论、历史学编纂方法论乃至历史研究方法论，在我们的古代经籍中，都能总结出系统理论来。

《尚书》突出的是历史盛衰总结的意识，在安邦治理社稷方面有系统的理论。

《周易》的大部分内容是出自史官、史家之手，明显体现出通变的历史见解。朱熹说：“《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秦时期史官兼掌卜筮，史官是

作《易》者，又是保存《周易》的人，预言历史前途。

《周礼》反映出来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三礼》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等级礼制的模式，并阐释这一模式的依据与价值，为制度的因袭与变革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诗经》在歌颂先王、总结历史盛衰的同时，又突出一种文化风俗史的观念。

《春秋》突出的是历史编纂思想，其深义在于“属辞比事”。《孔疏》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这表明《春秋》的编纂方式与历史观点合一，成为后世史书编纂的范式。《春秋》的起止、系年书事的书法等，都有深义的。《春秋》是史事、史文、史义三者的结合。《孟子·离娄下》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写 242 年间的历史，展示“世衰道微”的变化全局，写出“政自天子出”、“政自诸侯出”、“政自大夫出”各个阶段的变动。《春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态度明朗，对 242 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史事、人物的是非功过作了评判。

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毕竟没有成为经学的婢女。史学家在一定的限度内能够坚持走史学自身发展的路径，坚持求实的实录要求。司马光修史，没有完全按天理论的标准来编年系事，理学家因此称司马光学术“不纯”。有些史学家不满意经学家离开事实，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任情褒贬议论。如郑樵称以“灾祥论”解说历史的变动是“欺天之学”，至于鼓吹《春秋》中字字有褒贬，更是“欺人之学”。

总体上看，经、子对史学都产生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经学。经史相通在“义”、在经，六经皆史，与史之“义”在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再者，史学变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变动，但如果从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上说，史学发生变化，特别是史学思想发生变化，与经学及经学的演变紧密联系。同时，史学思想的变化又影响到经学的发展。

经学与史学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时代学术思潮。可以说，不研究经学就不可能理解史学，特别是不可能理解那个时代的史学思想；同样，不研究史学思想，也不可能认识那个时代的经学形成及其特有的风貌。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经史岂有二学哉”^①的认识。

我们还要指出，子学与史学的关联，与史学思想也不可分。古代史学家往往是一身多任，历代优秀的史家也是思想家，是子学中有贡献者，从而彰显出经史、子史的直接联系。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老子为柱下史，周守藏室之史，这不只从文献保存的意义上说，重要的是史学的根本理念。论变化之大道，说天地社会的消息盈虚，是《老子》最重要的观念，也是后世史的根本特性。古代的史与子，原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当年写《太史公书》是作为“成一家之言”提出来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之要旨”，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表明司马氏父子的作史是融会诸子以形成“一家之言”的，也就是史家之言。史之成“家”，始自司马迁。

司马光是史家，又是北宋“六子”之一，是周、二程、张、邵“五子”之外的又一“子”，《宋元学案》中特别为司马光立了《涑水学案》。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的史论，可以看到他受到荀子、扬雄的影响。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者也，周史之小宗也”；在《尊史》中说：治史要“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六经皆史”，同样，“六经”的原生态，也是子。诸子争鸣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史学思想的争鸣，是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又丰富了一个时代子学的内涵。只看到经学对文化其他部分的影响，而忽视子学的影响，是不全面的。明末清初的傅山说过：“经、子之争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六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

^① 钱大昕为《廿二史劄记》写的《序》，见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下）“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6页。

孔子、孟子不称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可见有子而后有经者也。”^① 具体一点说：

第一，子学为史学思想提供了历史观点的素材和思考模式。诸子关于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阶段的划分，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过程的思考。

第二，诸子百家对历史的源头、对人类的起源以及对初民社会的描述，内中有接近真理的因素，这些都影响到史学家的历史观念。

第三，诸子中关于历史大势的论述，关于历史盛衰变动的讨论，如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直接影响到史家治史、论史。

第四，诸子书是时代的思想史的资料，即使有些相关材料可以考订为“伪”，也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思潮，对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史、思潮史，又是“真”实的材料。

第五，诸子的历史知识的运用，体现为历史教育思想，是“畜德致用”的重要内容。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子对史学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史辨”时对诸子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也是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大景观。据说，罗根泽为编《古史辨》，写下的诸子研究的文字有40多万字^②。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钱穆等在经子与史学关系的研究上有不同见解，但都是有成就的。这方面有不少成果，全面总结只能俟之日后。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对传统史学的研究上有重要成就，在研究中为传统的经学、子学的研究开出了新天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思维定式上，论述了古代易学的成就，沟通了《周易》辩证思维与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是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子集校》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侯外庐一生四度对老子进行研究，前后经历20多年^③。范文澜的经学研究是突出的，他的史学反映出他的经学风格。

① 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八，《杂记三》。

② 周勤初：《罗根泽说诸子·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③ 侯外庐：《初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6、277页。

讨论经史关系时，对子史关系问题多说几句，是必要的，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也是丰富史学思想的内在根据。

今天，我们的中国史学思想研究，既展示民族史学思想是丰富的，又表明了中西史学相异又相通。以偏见评价中国史学思想，没有任何根据。发展当代史学的原则，还是章学诚总结浙东学术得出的认识：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①。看中国的经史子之学，看世界上不同流派的史学，要有这样的态度；西方学人看中国史学，也应当有这样的胸襟。

《经史关系论卷》是由汪高鑫教授撰写的。他多年研究经学，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在论说董仲舒与司马迁的经学史学之异同等问题上，辨析细微，阐发新见；讨论近代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是作者近年经史之学研究的又一关注点。本书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论说经史的联结，梳理几千年经史关系的变动。从历史观念、历史编纂学和史学社会功能等方面，解析经史的因缘关系。本卷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和活力之所在。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编五，《浙东学术》，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目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经史因缘 2

- 一、经史之学的兴起与史学的崇经意识 2
- 二、经史之学的玄化、分立与总结 10
- 三、“会归一理之纯粹”经学思潮下的史学 16
- 四、考据学的得失与经史之学的转向 20

第二节 经史尊卑的学术纷争 32

- 一、《汉志》“史附于经”问题 32
- 二、宋代“荣经陋史”观问题 35
- 三、明清与近代的“六经皆史”说问题 39

第一章 传统经史之学的历史观念 51

第一节 “究天人之际” 51

- 一、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52
- 二、从天命史观到“人”的觉醒——先秦天人观念的演变 62
- 三、汉代以后经史之学的“究天人之际” 68

第二节 “通古今之变” 78

一、传统经学的历史变易思想 78

二、传统史学的“通古今之变” 94

第三节 “大一统”思想 105

一、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105

二、汉代史学的“大一统”思想 121

三、宋代正统论的“大一统”思想 131

第二章 以经解史与以史证经 140

第一节 以经解史的治史路径 141

一、传统史学以经学礼法名教观念评价历史 141

二、传统史学用易学“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 150

第二节 以史证经的治经方法 163

一、以史事解经 163

二、以史事证经 169

第三章 经学撰述与史书体裁 177

第一节 “六经”撰述与传统史体的创立 177

一、《尚书》与传统史体的创立 177

二、《春秋》与传统史体的创立 183

三、《三礼》对传统史体的影响 189

第二节 理学撰述与史体的发展 193

一、理学与通史撰述的兴盛 193

二、理学与编年体的振兴 198

三、理学与新史体的产生 200

第四章 《春秋》笔法与史学求真 206

第一节 《春秋》之讳与史书褒贬 206

一、《春秋》经传的褒贬用讳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207

二、《春秋》笔法影响下的史书褒贬 215

第二节 《春秋》纪实与史学求真 226

一、《春秋》经传的纪实求真 226

二、《春秋》纪实影响下的史学求真 230

第三节 《春秋》之义与史学二重性 237

一、汉代《春秋》之义的神学化 238

二、传统史学二重性特征的形成 241

第五章 通经致用与史学经世 246

第一节 “六经”的经世致用思想 246

一、“六经”的忧患意识和历史借鉴思想 247

二、“六经”的通变观念与因革损益思想 253

第二节 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 257

一、内圣与外王：通经致用的两条路径 258

二、通经致用的时代特征 262

第三节 史学经世的基本特点 271

一、对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 271

二、史学经世的基本特点 274

第六章 近代化过程中经史关系的嬗变 284

第一节 救亡图存背景下的近代经史之学 284

一、倡导变革：近代经学的进步主张 285

二、救亡图存：近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主题 293

第二节 近代经史之学的嬗变与转向 302

一、今文经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303

二、古文经学改造经学为史学 318

主要参考书目 332

世發學史已用疑發斷 章正第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一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二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三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四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五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六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七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八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九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十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十一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十二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十三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十四策

恩恩用章世發所“發六” 第十五策

绪 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经学由此兴起。这种通过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得以建立起来的经学，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直至近代前期^①社会的百科全书之学，举凡这两千年社会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与礼仪制度等等，无一不包含于其中。从一定程度而言，研究中国经学，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研究。

中国又是个重视历史记录，因而史学极其发达的国度。我们不但有举世无匹的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文明史，我们同时还重视传承这一伟大的文明，因而有着记录这数千年文明史的史籍，二十四史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们通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这些浩繁的史籍。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经学和史学，它们之间的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

^① 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近代前期，经学虽然一直处在嬗变过程中，并呈现逐渐衰落的态势，以至最终走向了史学，但这种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经学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处于统治地位。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六章。

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能缺少历史的说明和验证。学术史上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虽然人们对其中含义的解释不尽相同，却颇能说明经史之间这种特殊和密切的关系。而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因缘，经史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历代学者津津乐道的问题。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经史因缘

中国的经学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提倡尊孔读经而兴起，与此同时，中国的史学也因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撰成《史记》而成就史家的“一家之言”。以此计算，经史之学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之久。然而追根溯源，经学与史学又皆肇端于先秦，而且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由于孔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才得以据此为经典，训释传记，从而逐渐形成经学；而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上古三代时期的“先王政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其蕴含的历史观点对于后世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尚书》、《春秋》等典籍还是中国史籍的直接源头。“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表明早在先秦经史起源时期二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观之，则中国古代的经史因缘至少要追溯到孔子整理“六经”的春秋时期。

一、经史之学的兴起与史学的崇经意识

从先秦到两汉，是中国经史之学发端和逐渐兴起的时代。先秦时期不但产生了汉代以后中国经学的基本典籍——“六经”，而且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史籍；汉代是儒家学说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经学由此而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而成为